

德國對「滿洲國」及「汪政權」 的外交態度

周惠民

1928年以後，中德雙方開始建立密切的軍事合作關係，使中國國防武力有長足進步，但仍不足以抵禦外侮。1930年代初期，日本開始進一步侵略中國，先佔領東北地區，又進兵華北，終在1937年演變成全面戰爭，德國夾在中日雙方之間，角色尷尬。一方面，德國與日本在1936年就簽訂共同防共協定；但其對中國的國防援助，卻成為對抗其盟邦的工具；而中日間戰事拖延，可能造成中國與蘇聯接近，妨礙其反共計畫。所以德國一直積極調停中日衝突。蔣介石不接受日本和談條件後，日本在中國境內扶植傀儡政權，並積極策動德國予以外交承認。德國必須不斷折衝，以牟取其最大的國家利益。本文討論此過程，並加以分析。

關鍵詞：汪精衛、滿洲國、德國、希特勒、蔣介石

一、前言

從 19 世紀中期起，自稱為「晚起民族(eine Verspätete Nation)」的德意志人開始要效法歐洲列強，希望加入「殖民俱樂部」。1860 年，以普魯士為首的北德諸邦，組成一支遠征艦隊，前往東亞地區，與許多國家簽訂商約。1870 年德意志帝國成立之後，許多商人、官員乃至平民團體都不斷要求政府從事海外殖民，擴大商業活動。到了 1890 年前後，在年輕的德皇威爾罕二世(Wilhelm II)主持下，德國積極計畫在東亞佔領港灣，建立殖民地，也對非洲有染指之意。1895 年以後，柏林政府時時以協助中國討回遼東半島有功為由希望租借港灣，未果，乃以曹州教案為藉口¹，派兵佔領膠州灣，強行租借並努力經營，希望能將青島建立一個「模範殖民地(Musterkolonie)」。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失利，在凡爾賽和約中被迫放棄所有殖民地，也喪失了在中國的特權。1921 年以後，德國與中國簽訂友好條約，重新進入中國，在各地建立貿易關係。德國工商業雖沒有特權保護，但仍以其品質及信譽，贏得許多中國人的信賴，成為中國的工業品供應者。

由於凡爾賽和約限制德國軍備發展，德國軍方為保持人員訓練及武器研發，開始與中國及土耳其等地進行軍事合作。這些大陸國家地理條件可供德國模擬武器及戰術，又急需軍火，故與德國建立密切關係。1920 年代中期，中國就扮演提供德國礦砂、糧食及油脂作物，及德國軍火工業的重要買受國的角色；更因為兩國都缺乏外匯，「以物易物(Barter Trade)」成為正常的貿易關係。中德兩國能夠維持相當穩定的邦誼的另一重要因素則是當時在中國積極活動的德國顧問，隨時為中德兩國的外交努力²。

近代歷史上，日本也與德國保持相當友好的關係，從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舉國上下要維新變法以圖強，德國成了學習對象。大批日本學生前往德國

¹ 1896年，先在兗州地區發生與德國傳教士有關的教案，1897年11月1日，再度發生曹州府鉅野教案，德國在山東教區總主教安治泰便在柏林遊說，希望德國政府派軍佔領膠州灣。

² 除了國民政府之外，各地軍閥也紛紛聘請德國軍事顧問，參見：周惠民，《德國對華政策研究》（台北：三民書局，1996）。

求取新知，日本政府也禮聘許多德籍人士到日本服務，德國的典章制度或文化思想都傳到日本，成爲日本近代文化的一個重要構成部份。

在日本成爲一個強權之後，也開始要在東亞地區奪取殖民地，中國就成了日本侵略的對象。當中日兩國發生衝突時，德國就處在一個相當尷尬的位置上，中國需要德國的幫助以對抗日本；日本則企圖切斷中德合作關係，以免中國擴張軍事力量，用之以對抗日本，雙方外交角力。1934年以後，日本爲對抗英、法等國勢力，擺脫其孤立之勢，更要尋求與德國結盟。

德國介於中、日之間，如果要同時維持與兩國的邦誼，就必須有相當的外交手段。德國原採取經濟優先的政策，嚴守外交中立，不介入東亞地區的糾葛。1933年以前，此種外交政策相當成功，德國對東亞地區的經濟因此能蓬勃展開。但1933年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控制政權之後，形勢逐漸改變。隨著日本在華侵略的加速，希特勒也對中國施壓：先接受滿洲國的領事，繼而承認滿洲國政權，甚至否定蔣介石政府，改而承認汪精衛政權，造成兩國在三十年內兩度斷交。對此，德國外交部的官員表示：「我們損失慘重，與蔣介石斷交意味著失去與這個巨大帝國的物質及精神關連。³」

在中德第二次斷交前，兩國關係受到日本在中國境內建立「滿洲國」政權與「汪精衛政權」兩次重大考驗。日本不斷要求德國給予這兩個政權外交承認，中國則堅決反對。當時德國內部意見原本一致，希望儘量維持現狀，但希特勒已經逐漸掌握政權，對東亞局勢有不同的看法，由於外交部官員的堅持，德國拖到1938年才承認「溥儀政權」。蔣介石雖然對此表達嚴重抗議，但爲了維持武器及軍事技術來源，並沒有採取過度激烈的措施。1940年，希特勒更進一步承認「汪政權」，是否正因蔣政府處理滿洲國時態度不夠積極，才造成希特勒的錯誤認知，以爲汪政權與滿洲國所可統轄者，同屬日本有效控制區，蔣介石應當不至於有強烈反應？

學界有關1930年代中、日、德三國關係的研究，已經有初步的成果，

³ Leonidas E. Hill (hrsg.), *Die Weizsäcker Papiere, 1933-1950* (Frankfurt: Propyläen, 1974), (以下簡稱 *Die Weizsäcker Papiere*) S. 262.

前東德史家德雷克司樂(Karl Drechsler)從社會主義史觀出發，對「小資產階級史學」有相當多的批判⁴，福克斯(John Fox)對德國的遠東政策也有相當多的探討，但以德國軍事顧問撤出中國為時間下限⁵。這兩本著作對汪精衛政權的出現及其意義都沒有觸及。而汪精衛政權的承認問題卻是東北亞地區局勢轉換的重要關鍵，德國承認汪政權之後，美國迅速給予蔣介石有力的支持，蔣也宣布對德斷交，日德關係趨於緊密，日本也根據其與德國的協定，積極部署對美作戰。幾個月之後日本所稱的「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對德宣戰。作者計畫根據中德雙方檔案，就此問題論證，說明中、日、德三國的複雜關係，先就滿洲國的外交處境與德國的對華政策做一說明，並將之與德國對汪政權的態度加以比較，並進一步分析這段期間中德關係變化的關鍵。

二、滿洲國的成立及國際承認問題

19世紀末年，日本才逐漸從列強侵略的厄運中解脫，並企圖以西方為師，建立一個類似西方的工業國家。但整個國家面臨許多近代國家的共同問題：缺乏資源、人口膨脹及缺乏工業成品市場等。1920年代以後，這些問題因國際經濟不景氣而益形嚴重。許多日本工商業者及政治領袖因此認為廣大富饒的中國東北地區——「滿洲」是解決日本物資缺乏、人口增加的唯一出路。日本對東北一直存有強烈的幻想，從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日本陸軍就首先提出中國割讓遼東半島的要求，卻因為俄、德、法三國干涉而被迫放棄。1904年，日本打敗俄國時，終能如願，不僅接收俄國在中國東北地區的特權，還駐紮軍隊，開發鐵路，甚至控制民政，成為實際的管理者，將東北建設成為「準國內狀態」。當時雖有所謂張作霖等奉系「軍閥」控制東北，但必須仰承日本關東軍的鼻息。即使是在華有長期利益的西方列強，也對日本控制

⁴ Karl Drechsler, *Deutschland-China-Japan 1933-1939, Das Dilemma der deutschen Fernostpolitik*, Berlin(Ost), 1964.

⁵ John P. Fox,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Oxford, 1982).

的東北地區不存有幻想。

早在 1928 年 6 月，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張作霖退往東北，被日軍炸死，張學良宣布歸順中央，中國形式上統一，給日軍極大壓力。1930 年代初期，受到經濟不景氣及國際裁軍的衝擊，日本國內政治並不安定，右翼極權氣氛興起，軍方更積極向外擴張，希望在境外建立一條屏障日本帝國的「生命線」。1931 年 9 月 18 日的「瀋陽事變」就是這種思想的具體表現。

日本原本沒有確切佔領計畫，控制「滿洲」之後，先採取分而治之的臨時手段，包括支持地方勢力建立臨時政府如「奉天市政府」（1931 年 9 月 21 日），「遼寧省地方維持會」（1931 年 9 月 25 日）；又支持部份省區脫離中央政府，例如吉林省獨立（1931 年 9 月 28 日）、黑龍江等各地均有關東軍支持的省級組織，還有如哈爾濱的「東省特別區長官公署」等。等到局勢稍微明朗之後，又計畫採取類似俄國製造外蒙古獨立的模式⁶，讓東北地區「獨立」。關東軍參謀坂垣征四郎於 1932 年 2 月底將東北各省行政長官如哈爾濱的張景惠、吉林的熙洽，黑龍江的馬占山等人集合至奉天，組織一個「東北地區行政委員會」，以張景惠為委員長；又以此委員會的名義，通電宣布「東北獨立」。日本所以如此處心積慮，就是希望實質控制東北之時，仍可避免國際間對其「侵略」的指責。當時英美等列強在東北地區的經濟利益不大，美國又採取「孤立」政策，英、法等國對日本的舉措，原本也沒有太大的興趣，「滿洲事變」發生之時，國際輿論也未加注意。

中國政府則限於實力，無力反抗，乃寄望於外交手段，在瀋陽事變發生時，不斷呼籲國際聯盟出面干涉。國際聯盟才接受中國的請求，於 1931 年 12 月 10 日決議，派遣一支五人組成的「李頓調查團(Lytton Mission)」前往東北調查。就在李頓調查團抵達上海之前，滿洲國外交總長謝介石向 17 個國家發表「通告」，希望他們承認「滿洲國」。由於美國並非國際聯盟之成員，

⁶ 1912 年，俄國利用中國建立共和，無暇兼顧的時機，與外蒙古簽訂「俄蒙協定」，幫助外蒙自治，代為練兵，不准中國派兵、移民。俄人享有特權，而列強並不干涉。

所以決定單獨對日本提出警告，1932年1月7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通知日本及其它九國公約的簽字國，表示：

美國政府不能承認任何事實上之情勢為合法。凡中日兩國政府或其代表訂立之任何條約協定，足以損失及美國或其人民在華條約上之權利；所損及中國主權獨立，或領土及行政之完整，或違反國際間關於中國之政策，即通常所謂門戶開放者，美國政府均無意承認。⁷

同時，國際聯盟同時也達成了共識：「無論就法理或事實，均不會承認滿洲現存政權。在有關滿洲的地位問題上，也不會單獨行動，而將與會員國或其它有關的非會員國協調一致。⁸」

此時日本為便於其擴大及確保在東北地區的控制，也為了表示對各國的不滿，遂於1932年1月28日出兵上海，製造「一二八事變」。此舉反而引起英法等在上海地區有重大利益的列強關切。日本為了加速建立傀儡政權的策略，便以清遜帝溥儀為「執政」，於1932年3月建立「滿洲國」⁹。

當日本外交官員在國際聯盟中為了滿洲國問題爭吵不休時，日本內部也有許多討論，外交及行政體系本不希望事件擴大，引發國際衝突，但部份軍官卻認為政府畏葸怕事，所以在5月間刺殺首相，製造「五、一五事件」。日本國內喧騰，先改組的內閣中，由原擔任滿鐵總裁的強硬份子內田康哉出任外相，他表示：「沒有滿洲問題，只有滿洲國承認問題」¹⁰，所以下令參與國際聯盟的代表退出國際聯盟，並立刻給予滿洲國外交承認。日本天皇也下詔表示：

⁷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中日外交史料叢編》，第五冊，《日本製造偽組織與國聯的制裁侵略》(台北：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1966)，〈美國務卿史汀生致中日兩國備忘錄〉(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頁270。

⁸ 'Report of the Assembly, Part IV, Statement of the Recommendations', Section III, in: O. Manly Hudson, (noted and instructed), *The Verdict of the League, China and Japan in Manchuria* (Boston: World Peace Foundation, 1933), p. 81.

⁹ 1934年3月，滿洲國改稱帝國，溥儀任皇帝，年號康德。

¹⁰ 陳鵬仁(譯)，〈日本外務省與中國政策(一九三一年—一九四一年)〉，《近代日本外交與中國》(台北：水牛出版社，1989)，頁143。

今次滿洲國新興，帝國尊重其獨立，促其健全發展，以為除東亞之禍根，保世界和平之基礎，然不幸聯盟所見與此背馳，朕乃令政府慎重審議，終於採取脫離聯盟之措施。¹¹

滿洲國雖然未受到國際承認，但其存在對日本帝國主義活動有重要意義，所以日本政府對「滿洲國」的存在相當堅持。名義上，溥儀在新京長春建立了一套獨立的行政組織，分設百官，行禮如儀。從其組織來看，滿洲國的中央政府各級部會組織多由中國人擔任部長、參議院議長等首長職務，應為中國人的政權，但實際權力則控制在由日本人擔任的各部會總務廳長官手中¹²。

根據 1932 年公佈的滿洲國《組織法》，滿洲國國務院中設外交部，掌管駐外使節及領事館的指揮，顯示日本政府要強調「滿洲國」的「國際法人」性格，但該部並無實際功能，到 1935 年止，「滿洲國」只有一個邦交國，加上駐德的代表。1937 年國務院再度調整組織時，索性取消外交部，改成一個直接屬於國務院管轄的外務局¹³。正因為滿洲國缺乏國際支持，所以日本政府一直希望能拉攏幾個強國承認「滿洲」，以強化其「合法」地位。滿洲國成立之後，日本一直企圖尋求列強承認，但在各國均表示不支持的情況下，日本估計，只有德、義等盟國最有可能給予外交承認，所以積極遊說。

三、日德有關滿洲國承認問題的交涉

1920 年代，德國雖然仍保有大國的條件，但在外交態度上非常保守，不希望因為外交摩擦引發其經濟或內政的危機，所以德國儘管是國際聯盟的成員，在 1931 年 10 月國際聯盟行政院開會決議派遣調查團時，委員的成員中

¹¹ 〈天皇詔書〉（1933.03.27 公佈），轉見：栗原健（著），陳鵬仁（譯），《昭和天皇備忘錄》（台北：國史館，2000），頁 50-51。

¹² 地方組織（省）中，也是由中國人任省長，而由日本人擔任的總務廳長主導實際政務的運作。實際決定一切政務的火曜日會議只有日本人參與，中國人均被排除在外。

¹³ 原有的駐日大使及駐德代表及一些領事館由國務院直接管轄，見：中央檔案館等（合編），《偽滿傀儡政權》（北京：中華書局，1994），第 3 冊，頁 232。

也有德籍委員，可是德國外交部特別訓令其代表：「如果在調查團中由我方主動，對滿洲問題提出任何解決方法的建議，會不符合我方的利益。我們完全同意英方的看法，該調查團不宜有太大的企圖。¹⁴」

日本駐柏林武官也曾於 1933 年 2 月前往德國外交部拜會外交部，希望德國在國際聯盟大會中對十九國委員會(Komitee der Neunzehn)的調查報告案之表決時，即使不支持日本，最少也要放棄投票。但德國外交部清楚的表示：無論如何，都會引起日方或中方的反對，所以表明對遠東局勢不做任何評論¹⁵。

另一方面，德國卻在東北地區有重大的經濟利益：

德國希特勒執政以來，為了粉碎凡爾賽舊體制和英、法的重壓，一直致力於整頓軍備，增強國力。因此，它注意到要同擁有大豆和其他農產品資源的滿洲國進行貿易。¹⁶

1933 年起，德國為了解決國內經濟問題，希特勒(A. Hitler)起用深獲其信任的沙赫特(H. Schacht)再度出任帝國中央銀行總裁，規畫經濟改革。沙赫特整個計畫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是調整並強化對外貿易，東北也是德國相當重視的重點地區。

在此時，突然出現一位自稱獲有希特勒授權的德國商人海耶(Heye)，到達日本，以貿易代表自居，希望建立據點，促進「德、滿」貿易。海耶原本於 1920 年代在哈爾濱與另一名德人埃森特雷格(Eisenträger)合夥經營一家「埃森特雷格海耶公司(Eisenträger, Heye & Co.)」，從事各種工業品買賣，但因為走私遭中國政府重罰，不得不宣布破產，返回德國。他後來與德國重工業集團蒂森(Thyssen)有往來，並由其經營者蒂森及戴慈(Daitz)等人引見，與

¹⁴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1918-1945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9) 以下簡稱ADAP, Serie B, Bd. XX, Nr. 190, 02. 07.1932., 'Ministerialdirektor Koepke an die Gesandtschaft in Peking'.

¹⁵ ADAP, Serie C, Bd.I,1, Nr. 28, 20. 02. 1933, 'Aufzeichnung des Legationsrats Czilinbuski'.

¹⁶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東北淪陷十四年史吉林編寫組譯，《滿洲國史一分論》(長春：吉林省內部資料，1990)，頁575。

執政的國社黨取得聯繫。他獲得與希特勒見面機會，並自我吹噓，希特勒誤信其有能力打開中國市場，乃授權其前往中國接洽商務。海耶於是先赴日本，自稱是希特勒特別任命的「德滿間經濟問題專員(Kommissar der deutschen Regierung für Wirtschaftsfragen zwischen Manchukuo und Deutschland)」，此行目的在於「以德國的工業產品交換滿洲地區的大豆及鯨魚油」。日本正希望能與德國進一步交涉滿洲的承認問題，所以對海耶相當重視。當時日本政府幾位內閣重要官員如荒木貞夫等人均曾與其會面，並介紹其前往「滿洲」。

事實上，日本政府早就體認到德國對東北的興趣，也一直希望利用貿易來引誘德國，早在 1932 年，日本駐新京大使館就認為：「即使國際聯盟不承認滿洲國，德國仍可以用秘密承認的方式進行。¹⁷」只是德國外交部態度一向謹慎，未能如東京所願。而海耶如此招搖，也引起許多在上海及東京的德國商人不安，許多人對其經營方式及人格均有意見，也有許多人擔心他的行動會招來嚴重後果，橫濱德國商會、上海德國商會乃至德國駐日使館也不斷向德國外交部表達海耶可能造成負面影響。而海耶雖抵達東北，並與當時日本重要領導如日本駐「滿洲國」大使菱刈等人會面，但均無具體成果。

1933 年 9 月，日本內閣改組，廣田擔任外相，採取比較和緩的外交政策，並不強調「滿洲國」的承認問題，但仍積極爭取德國對滿洲國的支持。廣田此時主要活動對象是德國駐蘇聯大使迪克森(von Dirksen)。東京方面瞭解迪克森與希特勒關係密切，所以數次邀請他前往「滿洲」訪問。但德國外交部一直反對，所以指示迪克森婉拒這項邀請，但迪克森卻表示「德國是滿洲國產品的最主要買主」，自然應當前往「滿洲」考察¹⁸，並直接向希特勒表達此意願。1933 年底，迪克森更進一步表示：日本駐德國大使向其遊說，認為德國已經退出國際聯盟，正可以承認「滿洲國」，以求取更大的經濟利益。經過迪克森幾次向希特勒反應之後，希特勒決定將迪克森改派到東京，以加強

¹⁷ 《六本木檔案》，〈公機密第965號，日本駐滿洲國大使菱刈致廣田外相電〉(未刊)，1932。

¹⁸ ADAP, Nr. 267, 'der Botschafter in Tokio von Dirksen an das Auswärtige Amt', 17. 02. 1934. S.474-475.

與日本的關係。根據迪克森對德國外交部的說法，希特勒曾經指示：「如果有經濟利益的話，我們願意承認滿洲國。¹⁹」這點可以說明希特勒等人對海耶或德國在東北商務寄予厚望。所以在 1934 年初，中國駐德公使劉崇傑就曾指出：「德當局及一部份人，惑於日本利誘大豆換機器，與日偽接洽經濟協定。²⁰」

但德國外交部官員對局勢有較為清楚的認識：日本雖然以經濟利益為誘餌，實際上也沒有任何具體承諾；而德國是否承認滿洲國，與國際聯盟的會籍無關，德國不願犧牲在中國的利益，才是關鍵²¹。德國外交部長牛賴特(K. v. Neurath)就表示：「到現在為止，我們只有虛幻的暗示，對於經濟發展的可能性，必須存疑。²²」所以當 1934 年 5 月間，海耶自稱與「新京」方面達成一項官方的貿易協定時，由於中國駐德公使向柏林外交部門提出抗議，德國立刻採取積極行動，一方面向希特勒之秘書要求取消海耶的一切秘密身份或任務²³，並指示其駐日大使及駐我國各地的使領館澄清。

中國政府此時正需要德國的協助，所以德國與滿洲進行有限度的貿易時，中國願意容忍。海耶案說明德國的經濟利益仍以中國為主，所以對此事也就不再深究。而日本政府有改採新的外交策略：為了壓迫中國，日本嘗試平衡與英、美等列強的關係，所以對滿洲國的承認問題稍加讓步，不再強求。正因如此，新改為駐日的德國大使迪克森就表示：「跡象顯示，日本政府，至少現在的內閣如此，對於滿洲國承認的問題，不像六個星期前那麼重視。²⁴」

¹⁹ ADAP, Nr. 267, 'der Botschafter in Tokio von Dirksen an das Auswärtige Amt', 17. 02. 1934. S.474-475.

²⁰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中日外交史料叢編》，第五冊，《日本製造偽組織與國聯的制裁侵略》(台北：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1966)，〈劉公使柏林來電〉(民國廿三年二月廿二日)，頁302。

²¹ ADAP, Serie C, Bd. II, 1, S. 9. Nr. 7, 'Aufzeichnung des Botschafters in Moskau von Dirksen', 17. 10. 1933.

²² ADAP, Nr. 256, 'Bülow an Dirksen, Berlin,' 09. 02. 1934. S. 474-475.

²³ ADAP, Serie C, Bd. III, 1, Nr. 22, S. 51, Der Reichsminister des Auswärtigen Freiherr von Neurath an die Botschaft in Tokio, 21. Juni, 1934 .

²⁴ ADAP, Nr. 267, 'Dirksen an AA', Tokio, 17. 02. 1934. S. 495.

德國外交部官員自然也瞭解：不要求各國承認，自然也不會付出相對代價。所以海耶的問題就不了了之。

四、從共同防共協定到日德軍事同盟

日本退出國際聯盟之後，日本外交部中許多官員與軍部唱和，主張積極對外擴張。先是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²⁵在 1934 年 4 月表示：「日本要對東亞秩序負起責任，反對歐美列強干涉中國事務」，可以說是亞洲版的「門羅主義」。大島浩²⁶與外交部許多中級官員人則希望促成日本與德國的合作。在這些人的鼓動下，日、德兩國開始商討簽訂共同協定的可能。

此時德國國內也有許多重大改變，1935 年起，德國又恢復了全面徵兵制度，1935 年 6 月，又與英國簽訂艦隊協定(Flottenabkommen)，英國同意德國艦隊可以與英國保持 35/100 的關係，無疑是同意德國不受凡爾賽(Versailler)條約有關軍備限制的束縛。1936 年 3 月 7 日，三萬名德軍揮師進入萊茵河非武裝區，控制阿亨(Aachen)、特里爾(Trier)，等於撕毀凡爾賽條約(Versailler Vertrag)及盧卡諾公約(Locarno-Pakt)。1936 年 7 月，希特勒更進一步與義大利共同出兵介入西班牙內戰，除了要強化其法西斯反共宣傳外，也要測試其軍備的能力。在積極建軍、備戰的國策下，希特勒開始加強其與軍事盟邦的關係，義大利首先表示歡迎，1936 年 11 月，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就公開宣揚「德義軸心(Die Achse Berlin-Rom)」²⁷。

英美等國對此政策的反應當然不佳，開始採取孤立日本的政策，爲了突破這種孤立，日本外交及國防部門中部分官員積極要促成日、德兩國合作。日本駐德武官大島浩更是積極。就在這些人鼓動下，日、德兩國開始商討簽訂共同協定的可能，而承認「滿洲國」，就成了兩國合作的最具體指標。1935

²⁵ 天羽英二(1887-1968)曾任駐哈爾濱、廣州總領事，1937年任駐瑞士大使，後轉至義大利，積極主張與德國及義大利締結同盟。

²⁶ 大島浩原任駐德武官，後升任大使，負責軍事同盟的談判，因日本國內對其法西斯性格過於強烈，將其調回國內，1941年，大島再度回柏林任大使，直到1945年戰敗投降為止。

²⁷ 1939年5月，德、義兩國簽訂同盟條約，稱為「鋼鐵同盟(Der Stahlpakt)」

年秋，大島開始與當時擔任國社黨外交顧問李賓特羅普(J. von Ribbentrop)²⁸有較為具體的洽商，雙方決定以「共同防共」為議題，簽訂合作協定，並多次接觸到滿洲國議題。但是日本內部文人對此有許多意見，例如駐德大使東鄉便不支持「共同防共」計畫。

1936年11月，日、德「共同防共協定(Antikomintern-Pakt)」由日本特使武者小路(Kintomo Mushanokoji)與李賓特羅普簽署，雙方約定互交換情報，共同防止共產主義擴張。稍後，義大利也加入這個協定，形成較緊密的合作關係。儘管德國外交部門對於與日德合作可能引起的外交困擾有些憂心，但在希特勒及李賓特羅普壓力下，仍同意德國先與滿洲國建立領事關係，並於1936年起接受滿洲國派領事官駐節柏林。

日本軍方對此提案有相當大的興趣，希望通過共同防共的具體作為，壓制蘇聯介入中日衝突，乃至挫退其侵略東亞的企圖。進一步甚至可以使英國拋棄其親蔣援華的政策，也迫使美國至少保持中立²⁹。

英國在華活動一直是日本關切的重點，英、日雙方也經常發生衝突，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事件」、1934年的「天羽聲明」均造成雙方不快，1936年10月，英國艦艇到基隆港訪問，發生衝突，英、日關係已經發生警訊，1937年以後，日本軍方對英、美敵視的態度更為明顯³⁰，1937年8月6日，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Hughe Knatchbull-Hugessen)在上海附近遭到日本飛機攻擊受傷，英、日雙方又因為日本進攻上海，海關問題發生衝突，1937年12月又發生日本飛機攻擊長江(蕪湖段)中的英國炮艇瓢蟲(Ladybird)號、美國砲艇帕奈(Panay)事件³¹。英、日關係不斷惡化，所以日本對德方提議加強合作案，

²⁸ 當時擔任德國駐倫敦大使，為希特勒外交政策的重要幕僚，1938年後擔任外交部長。

²⁹ 信夫清三郎(編)，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問題研究所(譯)，《日本外交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2版)，頁634。

³⁰ Irving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4), p. 110 ff.

³¹ 1937年12月11日，日軍已經與英國炮艇Cricket及Scarab號發生近距離的對峙，12日上午，日軍攻擊長江中的英國炮艇Ladybird，造成人員傷亡，同日下午，又攻擊美國砲艇Panay，砲艇受損，人員受傷。參見：楊凡逸，《美日帕奈號(U.S.S. Panay)事件與中美關係(1937-1938)》(台北：

立刻有積極回應，只是有關強化軍事合作的交涉並非經由正常外交體系，而是由李賓特羅普與日本駐德使館的武官大島浩交涉。日本駐柏林大使東鄉與德國駐東京大使迪克森均不知情。

此時希特勒最關切的政策方向是「征服新的生存空間(die Eroberung neuen Lebensraums)」，1936年9月國社黨在紐倫堡召開黨大會，把向東發展作為重要目標。為避免國際社會的壓力，希特勒希望與英國保持一定程度的友好關係，並派遣李賓特羅普駐英，希望與英國建立同盟關係，但倫敦政府對建立同盟一事絲毫不感興趣，明白拒絕。李賓特羅普對此事耿耿於懷，並一直對英國抱持敵意，因而希望拉攏日本以對抗英國³²。

1937年7月，日本發動「七七事變」以後，必須在中國投入大量的軍隊，但一直也無法達成其預設「三月亡華」的目標。德國方面認為日本對華戰爭會讓蘇聯得利：

日本企圖說日本在華的軍事行動根據反共同盟是誤導的，我們看到的日本行動恰恰與反共同盟相背。不但阻止中國的團結，更使得共產主義在中國傳播，更讓中國與俄國接近。³³

日本外交部門卻在德國發動廣播攻勢，宣傳日本對華戰爭有益於共同防共的主張，更引起德國外交部的不快。日、德雙方開始發生摩擦。日本卻屢屢向德國政府抗議，認為德國向中國提供軍事顧問及武器是軍事行動無法早日結束的主要癥結。1937年年9月，國社黨內部文件中指出：德、日關係之發展，使德國失去在華之各種利益，尤其是經濟方面，而這些損失無法從日本處獲得補償³⁴。所以當時德國在遠東的主要外交工作重點是調停中日衝突，日本也希望能儘早結束衝突，發動了義大利與德國，積極在中、日間奔走。只是所有努力均無成效，當日軍於1937年底攻下南京，造成中國平民

政治大學，2002)。

³² 學者對這一時期德國的外交政策往往有相當歧異的看法，重要原因之一是李賓特羅普的人格特質並不穩定，外交政策也無法一致。

³³ ADAP, Serie D, Bd. 1, S. 606.

³⁴ 郭恆鈺(編)，《德國外交檔案》(台北：三民書局，1991)，頁59。

大規模損傷時，中日兩國已經很難和談，德國必須抉擇。1938年2月，希特勒將外交部長牛賴特免職，改由李賓特羅普接任，開始改變其外交政策，並欲進一步加強與日本的合作。1938年1月，李賓特羅普再對大島提出了建立「日德軍事同盟」的建議，並更進一步的釋出善意：願意承認滿洲國。

日本外交部主政的常任文官系統對「日德軍事同盟」有相當意見，認為此舉會破壞日本與列強的關係，海軍省大臣米內即明白表示：日本如與德義合作，必然會遭到英國的報復，部分日本內閣對軍事同盟也持保留的態度，認為此舉可能會刺激美國，反而迫使美國與英國合作，對日本不利。由於此時日本仍希望與中國談判，達成停戰，陸軍省及海軍省於1938年8月，召開聯席會議，許多與會者認為日德軍事同盟無益於中國問題的解決，對同盟持相當保留的態度；加上此時日本內閣變動的頻率相當高³⁵，1938年5月到10月間，外務省大臣兩度更替，所以同盟之事，懸而不決。

1938年中，日軍在中國的軍事行動推進的相當快，中國的首都已經被日本攻下，外交部門中的鷹派勢力也逐漸抬頭，反對日、德、義三國同盟的駐德大使東鄉被派往蘇聯，由大島浩繼任，白鳥敏夫則接任意大利大使。民間右派勢力的聲浪逐漸興起，要求對英美採取強硬外交手段。大島浩、白鳥敏夫等人直接與日本參謀本部商討，希望促成日、德、義三國合作。但1938年10月，有田出任外相之後，日本的外交政策暫時回到廣田的路線上，企圖調整與美國的關係，避免直接衝突。1939年8月底的阿部內閣成立後，甚至將大島及白鳥調回國內，以避免三國過度接近。

而德國眼見無法立刻達成其目標，又擔心蘇聯與英、法等國過於接近，改採與蘇聯合作的政策，除了離間英、俄之外，也便於進行其吞併東歐地區的波蘭及捷克地區的計畫。原本1938年9月德國與英法簽訂的「慕尼黑協定(Münchener Abkommer)」就鼓勵了希特勒對東歐採取進一步行動。1939年5月，希特勒與義大利簽訂「友好及軍事同盟(Freundschafts- und Bündnispakt)」，又在8月，與史達林達成了「德蘇互不侵犯協定(deutsch-sowjet.

³⁵ 1937年到1940年間，內閣平均壽命只有半年。

Nichtangriffspakt)」，希特勒隨即下令攻擊波蘭，日德兩國關係，則有明顯的倒退。1939年初，外交部次長衛塞克就已經表示：

當我們開始與俄國人遊戲時，李賓特羅普與大島的熱烈友誼便降溫。……我們換騎俄羅斯馬後，再與東京交往時，立刻瞭解日本人無論是速度或音調上，都開始疏離我們。³⁶

日德關係要到1940年日德兩國討論承認「汪政權」的問題時，才有改善。

五、汪精衛政權成立及其承認問題

雖然滿洲國成立以後，一直沒有受到國際的承認，但日本對其態度，仍是相當堅定，所有的政治發展，均由日本指導。汪精衛政權就沒有如此幸運，一開始，日本就以汪精衛政權為談判籌碼，作為逼迫蔣介石談判的工具。

日本侵略中國之際，廣泛的運用「以華制華」的策略，前後有「北平臨時治安維持會」、「天津地方治安維持會」、「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等，並計畫逐步將各個維持會整合成一個傀儡政府。日軍攻陷南京的次日，以王克敏為「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也出現於北平。儘管成立了許多傀儡政權，蔣介石仍能夠有效的組織軍隊，抵抗日本。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之後，蘇聯也願意利用機會，提供中國必要的援助，讓中國將日軍拖住。因為東京仍對與蔣介石和談一事抱持希望，並不積極壓迫德國承認汪政權。德國也因為遠東佈局的考量，不希望中、日衝突擴大，1937年11月德國外交部就已經提醒希特勒：「看看領袖希望是法肯豪森將軍站在蔣介石身邊，還是換一位蘇聯將領？」³⁷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O. Trautmann)與駐日大使迪克森就負擔起信使的工作，奔走於兩國之間。

戰事初起之時，日本自認為可以戰勝蔣介石，提出的停戰條件極為苛刻，蔣介石根本無法接受。溝通無效，日本首相近衛乃在1938年1月聲明：日本「不以蔣介石為交涉對象」，改採在中國建立傀儡政權的策略，希望以

³⁶ *Die Weizsäcker Papiere*, Frühjahr 1939, S. 177.

³⁷ ADAP, Serie D, Bd. I, S. 634.

此逼迫蔣介石就範，並無成效。日本新任外交部長宇垣又開始與孔祥熙的親信在香港展開會談。但宇垣隨即辭職，與蔣介石的聯繫中斷，日本態度又轉變。1938年5月，德國正式承認「滿洲國」，原任駐新京總領事擔任公使。日本軍方的影佐禎昭與今井武夫則開始與汪精衛的代表高宗武及梅思平兩人商議，希望能建立「中日和平」。1938年11月，雙方達成協議之後，汪精衛在河內發表「豔電」，同意接受日本安排，1940年3月，汪精衛宣布「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並承認「滿洲國」。

汪偽「國民政府」成立後，日本也希望能夠使其政權獲得友邦承認，因此積極安排德國與義大利等「軸心集團」的承認。德國雖然在1938年5月承認了「滿洲國」，滿足日本的初步要求，但德國外交部門相當清楚：「滿洲國」一直在日本的控制之下，對其承認，並不影響蔣介石的領導，所以蔣介石上可以忍受，所以1938年5月9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德國外交部報告蔣介石的態度：「儘管承認了滿洲國，中國政府仍然努力維持既有的友誼。³⁸」

1938年底，日本揭櫫了「東亞新秩序」的主張，引起英、美兩國的緊張，開始密切注意日本的內部動態，並且與法國一起提出抗議日本封鎖長江的作法，英國又加強與蔣介石的合作，包括提供貸款等等，此舉當然加深了日本的敵意。1939年2月，日本海軍攻擊海南島，計畫進入中南半島，與英國開始有衝突。1939年以後，英、美加強合作，限制許多軍事物資銷售到日本，7月，美國更決定廢止「美、日商務條約」，美日關係也不斷惡化。

這種情況，符合了德國方面的期待，所以德國一方面希望日本儘快結束與蔣介石的衝突，另一方面，希望日本出兵新加坡，展開對英國的攻擊。因此，李賓特羅普又開始要與日本協商簽定同盟事宜。1940年7月，日本內閣改組，近衛文麿擔任首相，東條英機為陸相，松岡洋右擔任外相之後，日本主戰派的勢力抬頭，9月底，「三國同盟(Dreimächtepakt)」便成立。德國官員就清楚表示：三國同盟主要是針對美國。所以三國同盟成立之後，世界分成

³⁸ ADAP, Serie, D. Nr. 582, S. 698.

兩大陣營的情況變得相當明顯。

由於中、日戰事膠著，中、德關係也日漸緊張，所以蔣介石陣營中許多人主張強化對蘇聯外交，牽制日本。日本為思反制，也與蘇聯展開談判，避免蘇俄與中國接近。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甚至計畫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德國並不希望見到日、俄接近，轉求中國能與日本和談。就在日、德、義三國同盟成立之後，柏林傳到重慶的信息指出：德國希望能調停中、日戰事，並擬議和平條件為：

日承認蔣政權，日本撤兵，我(中)國承認偽(滿洲)國及華北日本特權，並以滬、青島、福州、香港、汕頭為日本海軍根據。德以安南、荷屬印度讓日。³⁹

李賓特羅普並於 1940 年 11 月約見駐德國大使陳介，表示：德國雖迫於政治現實，不得不側重親日，但對中國一直保持經濟上的關聯。現因為日本新內閣成立，打算承認南京，並極力促使德國也對之加以承認；而德國實在不希望與中國關係惡化。李賓特羅普最後提出要求：

倘閣下認為(中、日)有和解可能，則請轉達蔣委員長及貴政府加以考慮，以免誤此最後時機。⁴⁰

只是蔣介石不為所動。

1941 年 4 月，松岡與蘇聯達成「互不侵犯協定」，又極力要求海軍自我約束，避免與美國發生衝突，希望進一步協商「日美諒解」。德國外交部為此甚為憂心：

我們不樂見日美間的協商。以目前日美協商的內容看來，日本會背離我們。我們必須獨力承擔對英美的戰鬥。三國同盟將失效。⁴¹

不止希特勒擔心，如果情勢繼續如此演變下去，不但無法對抗蘇聯，甚

³⁹ 馬振犢(編)，〈譚伯羽來電(1940年10月3日)〉，《中德外交密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64。

⁴⁰ 馬振犢(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日十一日陳介真電〉，《中德外交密檔》，頁64-65。

⁴¹ ADAP, Serie D., Bd. XII. 2, Nr. 517, 'Der Staatssekretär an Den Aussenminister.' 15. 05.1941.,S. 682.

至會讓蘇聯坐大。就連日本軍方也有意見，例如日本駐德大使大島也認為：「日本的國內政策搖擺不定，使駐外人員難為。⁴²」，正因日本外交部的作法令德國感到不安，德國外交部次長也表示：

愈來愈不清楚松岡的遊戲，如果知道英國（在遠東）即將受到挫敗，卻不對美國要平衡太平洋勢力的引誘並沒有努力拒絕。⁴³

所以德國只好放棄中國，願以承認汪政權為代價，鞏固亞洲盟邦，以避免日、俄過於接近。

先是在 1940 年 11 月底，日本與汪精衛政權簽訂「中日國交調整條約」及「中日滿共同宣言」，宣示三個政權進一步合作時，意大利已經表示祝賀之意，羅馬也傳出義大利已經決定承認南京政府的消息⁴⁴，到了 1941 年 1 月，義大利外交部長齊亞諾發電報給汪精衛祝賀新年⁴⁵對汪政權的態度已經相當明顯，但德國仍持保留態度。此時日本再度表示希望德國承認汪精衛政權，德國乃決定調整步伐，1941 年 2 月，日本外交部官員已經知道德國即將承認南京政權，甚至滿洲國的報紙，已經大幅報導：德國可望在兩個月之內承認汪政權⁴⁶。1941 年 3 月，德意志通訊社(DPA)開始進入南京，其他相關官員例如德國駐上海總領事費霞(Fischer)也開始前往南京，準備重新開設使館。

1941 年 6 月底，德國外交部秘密通知駐華大使及駐重慶的領事館，即將與汪精衛建交。當時德國在華的外交人員立即表示並不贊成德國承認汪精衛政權，但並無法動搖李賓特羅普等人的決心。中國方面也獲得情報，駐德大使陳介特別前往德國外交部詢問此事，並表明：「承認汪精衛就等於宣布與蔣介石斷交」。得到的答覆卻仍是：「尚未獲悉消息」。但陳介向重慶回報：

（德國）外長業已決定並擬將在渝機關不動，而令上海總領事兼駐偽政

⁴² *Die Weizsäcker Papiere*, 08. 06. 1941., S. 258.

⁴³ *Die Weizsäcker Papiere*, 01. 06. 1941., S. 257.

⁴⁴ 《盛京時報》，1940.12.03.

⁴⁵ 《盛京時報》，1941.1.22.

⁴⁶ 《盛京時報》，1941.2.19.

府代表。蓋將汪偽視為偽滿第二。⁴⁷

德國外交部相信這樣的安排應可照顧到中日雙方的利益，但蔣介石並不接受這樣的安排，中國政府也清楚：德國的承認汪精衛將是一個集體行動，義大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哥羅提亞(Croatia)及「滿洲國」等國，均同時給與汪精衛外交承認。就在德、義等國宣布承認汪政權的次日(1941年7月2日)，蔣介石立刻宣布：

德義兩國政府竟已承認南京偽組織，是其侵略政策顯已推及遠東，且又充分證明納粹德國與法西斯意大利已與中國之敵人同惡相濟，……實為加於中國之重大侮辱。……茲特正式宣告，中國與德、義二國斷絕外交關係。⁴⁸

8月初，陸續有西班牙及丹麥承認南京汪偽政權。稍後，南京政權也應邀加入共同防共協定⁴⁹。汪精衛原本希望將中華民國原駐德大使陳介留任，表示政權接續，但陳介等人員並未同意⁵⁰，均撤往法國，取道返回中國。直到1941年9月汪精衛才派李聖武擔任汪政權駐德國大使。

德國承認汪政權之後，日、德雙方的溝通逐漸好轉。近衛內閣撤換外長松岡，另以海軍大將豐田擔任外長。此時法國維琪政府在德國控制下，日本與德國協商之後，開始出兵越南，美國立刻升高對日本的警戒，禁止對日輸出石油，雙方敵意逐漸升高，日本軍方的態度則愈來愈傾向發動戰爭。1941年9月，近衛內閣下台，東條英機組閣，11月底，日本就已經決定發動對美戰爭，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在日美爆發衝突同時，德國也立即向美國宣戰，美國因此向軸心國正式宣戰。中國也於事變後一日(12月9日)宣布與德、義兩國處於戰爭地位：

⁴⁷ 馬振犢(編)，〈陳大使儉(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八日)電〉，《中德外交密檔》，頁69。

⁴⁸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第三編，《戰時外交》，第703-704頁。

⁴⁹ 馬振犢(編)，《中德外交密檔》，頁504，〈汪精衛為德國駐汪偽大使呈遞「國書」所致答詞，一九四一年〉。

⁵⁰ 馬振犢(編)，《中德外交密檔》，頁70，桂永清電文，1941年7月5日。

最近德、義與日本竟擴大其侵略行動，破壞全太平洋之和平，此實為國際正義之蠱賊，人類文明之公敵，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此礙難再予容忍，茲正式宣布自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十二時起，中國對德意志、意大利兩國立於戰爭地位，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義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⁵¹

但是日本仍不願對蘇聯採取攻擊行動，未能符合德國的期待。1943年9月，德國外交部官員表示：

情況顯示：日本最高指揮部門從與中國的大空間戰爭中學到教訓，只有在對手俄國人已經完全被打敗的情況下，才願意發動第二個大空間戰爭。⁵²

的確，為了避免兩面作戰，日本一直嘗試與俄國人協商，所以直到戰爭結束，德國人都沒有等到日本出兵攻打俄國。

六、結論

對日本而言，滿洲是一個廣大而富饒的地區，除了物產豐富以外，地理上也自成一個單位，長期在日本的控制之下，從1932年以後，日本在當地建立的傀儡政權，不但不成爲日本的負擔，反而一直是日本經濟的重要命脈，所以正如當時日本政府宣稱：沒有「滿洲問題」，只有「承認滿洲國」的問題。但是汪精衛的南京政權則完全不同。一方面，南京政權並沒有清楚的轄區，而是日本將在其佔領區中畫出一部份作爲南京政權的領土，南京政府能統治的地方有限，因此財政上一直無法獨立，必須依賴日本的支援。許多日本官員對南京政權並不友善。周佛海於1941年6月訪問東京，洽談一筆三億元的借款，日本陸軍省官員就表示：「軍部所接情報，無一讚揚國府

⁵¹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三編，《戰時外交》，頁704。

⁵² ADAP, Serie E, Bd. VI, 'Aufzeichnung des Legationrats Braun, Berlin', 30. 09.1943, S. 607.

者，如國府同仁不自努力，恐日本人會失去援助熱忱。⁵³」

事實上，日本對汪精衛的態度，本來就相當猶疑，如果蔣介石願意與日本和談，日本顯然隨時可以放棄汪精衛政權。

日本人早就體認，決無法透過與無力的汪精衛政府合作，解決中日衝突。他們也不避諱一直努力，希望與蔣介石達成諒解，並儘快達成和平協議。⁵⁴

直到 1943 年，還有所謂的「繆斌工作」，希望與蔣介石和談。當然，時間越晚，戰事越擴大，就對日本越不利。蔣介石一開始並沒有排除與日本停戰，所以到了 1941 年底，陳介等人仍然主張「中日停戰」，蔣介石也沒有完全反對。但 1942 年日本與汪精衛簽訂調整國交，美國決定對蔣介石加強合作關係之後，情況開始變得緊張，中日關係就無法轉圜了。

在整個交涉過程中，日德兩國各懷鬼胎，也都高估了對方的實力。例如 1940 年 9 月，三國同盟成立之時，德國官員感到相當意外，認為日本願意加入軍事同盟對德有利，甚至表示：「不是日本低估自己太弱，就是高估德國。⁵⁵」同樣的，1939 年以後，德國除了擴大其在東歐的戰果外，又進攻法國，轟炸英國，給日本軍方相當的錯覺，認為不立刻與德國結盟，將是一種錯誤⁵⁶。德國便以承認汪精衛政權為重要工具，企圖說服日本對俄國宣戰，促成日德間進一步的合作。此舉雖然有效阻止日俄進一步接近，可是他的預期目標—日俄開戰，卻一直要等到德國投降之後才出現，而且只有象徵意義。

⁵³ 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1941年6月30日條〉，頁539-540。

⁵⁴ ADAP, 09.02.1942.

⁵⁵ *Die Weizsäcker Papiere*, 1940. 9.28. S. 219.

⁵⁶ 栗原健著，陳鵬仁譯《昭和天皇備忘錄》，頁99。

參考書目

一、檔案

1.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1918-1945,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9.
2. Hill, Leonidas E. (hrsg.). *Die Weizsäcker Papiere, 1933-1950*. Frankfurt: Propyläen, 1974.
3. Hudson, O. Manly (noted and instructed). *The Verdict of the League, China and Japan in Manchuria*. Boston: World Peace Foundation, 1933.
4. 《六本木檔案》，東京，未刊。
5. 《盛京時報》。
6.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三編，《戰時外交》，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7.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中日外交史料叢編》，第五冊，《日本製造偽組織與國聯的制裁侵略》，台北：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1966。
8. 馬振犢(編)，《中德外交密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9. 郭恆鈺(編)，《德國外交檔案》，台北：三民書局，1991。
10. 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5冊補編，1937-1945，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11. 復旦大學歷史系日本史組(編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上海復旦大學，1992。
12. 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二、專書

1. Drechsler, Karl. *Deutschland-China-Japan 1933-1939, Das Dilemma der deutschen Fernostpolitik*. Berlin (Ost), 1964.
2. Fox, 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Oxford, 1982.
3. Friedman, Irving S..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4.
4. 中央檔案館等(合編)，《偽滿傀儡政權》，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
5. 周惠民，*《德國對華政策研究》*，台北：三民書局，1996。
6. 信夫清三郎(編)，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問題研究所(譯)，*《日本外交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2版。

7.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8. 栗原健(著)，陳鵬仁(譯)，《昭和天皇備忘錄》，台北：國史館，2000。
9. 陳鵬仁(譯)，《近代日本外交與中國》，台北：水牛出版社，1989。
10. 楊凡逸，〈美日帕奈號(U.S.S. Panay)事件與中美關係(1937-1938)〉，台北：政治大學，2002。
11.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東北淪陷十四年史吉林編寫組譯，〈滿洲國史-分論〉，長春，1990。

German Attitude towards Man-zhou-guo and Wang Jing-wei Regime

Chou, Whei-m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Since 1928 German started a military cooperation program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helped China set up a military force, in the hope to defend herself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fter the Mukden-Incident 1931, Japan quickened her invasion in China. In order to justify her aggression, Japan supported several puppet-regimes and sought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Germany, being Japanese main ally after the Anti-Comminter Pact of 1936, was under enormous pressure and tried to mediat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author will look into Japanese-German negotiations and describe aspects from both sides as well as the Chinese response.

Keywords: Wang Jing-wei, Man-zhou-guo, Japan, China, German, Jiang Jie-shi